

关于德富苏峰纪念馆藏“李慈艺告身”的照片*

(日)小田义久著 乜小红译

内容提要:1912年3月,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掘得了唐开元四年制授高昌县人李慈艺为上护军的“告身”原件,这是一件极为珍贵的西域文物。但它的内容,除上世纪初,罗振玉、王国维曾摘录其部分文字外,学术界长期未见其真面目,而且原件至今已不知去向。所幸当时爱好者德富苏峰氏收藏有该“告身”的照片四帧。日本知名吐鲁番学专家小田义久教授前往调查,公布了此“告身”的全部照片及其来历,使得学术界得见“告身”原貌。此“告身”对研究唐开元初西域形势、朝廷对策提供了许多新信息,同时也为研究唐朝廷“告身”原件,展示出了一个珍贵标本。

关键词:吐鲁番出土文书 告身 李慈艺

中图分类号:K8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2003)02-0027-10

—

很早以前我曾委托东洋文库的篠崎阳子氏(本校文学硕士)研究本校大宫图书馆所藏的堀贤雄旅英时的英文笔记。1999年11月初,从她那里得知德富苏峰纪念馆收藏着李慈艺告身照片这一消息。于是我立刻与德富苏峰纪念馆盐崎财团常务理事的高野静子取得联系,并得以于同月下旬访问该纪念馆、调查实物。当天除高野氏外,还得到了评议员宫崎松代、图书馆员和田千枝子的热情接待。我乘新干线在小田原下车后,改乘JR东海道线至第三个站即二宫站。下车后从北出口徒步行走十三分钟,就到了德富苏峰纪念馆,它背倚丘陵,前拥相模湾。今年(1999年)正值该馆成立三十周年之际,因此从1月6日起至12月20日间该馆正在举办名为《苏峰及其时代展——明治编》的展览,展出了至今为止整理好的明治时代的有关资料。展出的是代表着明治时代的各位首相、财团名人、文人与苏峰的来往书信,而在其中也夹带展出了来自大谷光瑞师的五封书信和橘瑞超的一封信。^①

高野静子著有《苏峰及其时代——从收到的书信谈起》一书(中央公论社,1988年。以下简称高野《苏峰及其时代》)。据该书所收的《大谷光瑞》一文的记述,该馆收藏了光瑞大师给苏峰氏的二百四十封书信及橘瑞超给苏峰氏的二十七封书信。^②据说高野氏任职之初,曾经特意把光瑞师的书信保存在收藏库最显眼的地方,将其放入木箱,并贴上写着“大谷光瑞师之书信”几个大墨字的字

* 本文原文载日本《龙谷大学论集》第456号第122—141页。

① 德富苏峰纪念馆目录(16)“苏峰とその时代展——明治编”,第17页。

② 高野《苏峰とその时代》第297页和第315页。

条。^③

德富苏峰于文久三年(1863)一月生于熊本,而大谷光瑞师则生于明治九年(1876)十二月,据此可知前者长于后者十四岁。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活跃于明治时代的二人结下如此深厚的友谊呢?

昭和三十一年(1956)五月,大谷光瑞师纪念会发行的《大谷光瑞师的一生》上登载了苏峰氏执笔的《史传大谷光瑞师》一文(苏峰氏写于九十三岁,以下简称苏峰《史传》)。据该文章说,二人是由光瑞师的父亲即本愿寺二十一世明如上人的介绍认识的,而后经过日俄战争(1904—1905)使得二人更进一步地成为挚友。^④他们都曾接受过汉文化的教育,有着相同的兴趣,甚至同是主张出国留学的启蒙者。苏峰氏回忆说,他们二人的人生道路就象两条平行线,虽然常会因为各自身边的事物和环境的变化而时远时近,但命运却注定了他们必须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⑤

尽管人们对大谷光瑞师的评价是各种各样的,但他作为第二十二代宗主,成功地主持了宗祖的第六百五十回大远忌法令,三次进入西域探险,这些闻名的事迹都是众所周知的。此外,今年十月二十三日(周六)至十二月五日(周日)在芦屋市美术博物馆召开的本学科新生力军的现代式再考《二乐庄与大谷探险队》会上,也明确指出光瑞师的以神户六甲二乐庄为中心的活动是有必要引起重视并加以大书特书的。^⑥关于二乐庄、苏峰氏也在《史传大谷光瑞师》中提及,说是光瑞师以京都作为总寺院,而将活动本部置于二乐庄,并由此推测是否可以认为光瑞师的一切革新计划都准备从此地开始。^⑦此外,还记载说苏峰氏最后一次拜访二乐庄是在大正二年(1913)六月二十九日,并受到光瑞师、橘瑞超氏及柱本瑞俊氏等的热情招待。^⑧而据《镜如上人年谱》所记载,第二天即三十日,光瑞师将在京都主持桃山御陵参拜等祭祀,由此可知,他当日与苏峰氏面谈之后立即回到了京都的本山。^⑨

昭和十二年(1937)三月,七十五岁的苏峰氏收集了上原芳太郎对当时活跃于新疆、印度、泰国、锡兰、云南、西藏的十七名探险队员的记录,将其分成上下两卷合成命名为《新西域记》的大著,并进一步提笔为其写了序文。他认为队员们所到区域之广大,是智猛、法显、玄奘和义净等其他所有古今渡天竺巡礼者所无法企及的,并对此进行了极大的颂扬。^⑩由此可见,大谷及其身边的人与苏峰氏的亲密关系。

二

根据高野静子的说明,这次新发现的照片,是在整理收藏库的过程中,在装有照片的白铁皮大箱中找到的。在17.5(宽)×54(长)厘米的照片衬纸上(衬纸正面是黑的底色,背面无花纹)并排贴

③ 高野《苏峰とその时代》第297页。

④ 苏峰《史传》第123页。

⑤ 苏峰《史传》第124页。

⑥ 详细参照芦屋市立美术博物馆平成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刊登的豪华图录《モダニズム再考・二乐庄和大谷探险队》(以下简称为芦屋美博《图录》)。

⑦ 苏峰《史传》第29页。

⑧ 苏峰《史传》第32页。

⑨ 镜如上人七回忌法要事务所《镜如上人年谱》(本愿寺1954年)(以下简称为本愿寺《年谱》)第71页。

⑩ 大谷家藏版《新西域记》上卷(有光社1937年)第2页。

着四张照片。(见图版)背面10行是时年五十岁的苏峰先生的墨书说明(见图版)。现将这一背书移录如下,并就李慈艺告身的拍摄前后经过进行若干考察。

(背面)

1. 明治四十五年六月
2. 十六日于筑地本
3. 愿寺摄影焉是
4. 橘瑞超师西域
5. 发掘物中之最
6. 尤之一也
7. 苏峰学人
8. 看姚崇、苏頔
9. 开元贤宰相
10. 名字

从背书得知:这一系列照片原来是于明治四十五年(1912)六月十六日,在东京筑地本愿寺拍摄,实物由橘瑞超先生带来的。由于同年的七月三十日,明治天皇驾崩,改号为大正元年,恰是这一事件发生的一个月前。这年(1912)大谷探险队队员橘瑞超先生一月二十六日与吉川小一郎先生在敦煌会合后,三月份又在吐鲁番从事阿斯塔那、哈喇和卓古墓群的挖掘工作。然后到达乌鲁木齐,四月二十六日(周五)自乌鲁木齐出发,经鄂木斯克由西伯利亚铁路回国。当年六月五日,橘氏回到京都,就马上赶赴二乐庄回报。^①德富苏峰纪念馆保存了橘氏写给苏峰先生的二十七封信,其中有一封是橘氏用印有二乐庄用纸字样的信纸写给苏峰的六月六日的信,这是一封橘氏回国后的寒暄信,信中草草写了这么一句:“拟于近日东上时,于楼兰故城址附近所获怪柳手杖和哈喇和卓村郊外古墓出土的手杖一根,作为西域探险的礼品赠上。”听说苏峰是手杖的爱好者,关于上述手杖,据高野氏所说:“送给苏峰的二根手杖,目前在何处保存?无从得知,实在遗憾。”由于下落不明,苏峰纪念馆也无从保存。^②关于这二根手杖,笔者曾写过一篇文章。当时,关于哈喇和卓古墓出土的手杖的主人问题,我说过在橘氏的文件(大谷11033号)“高昌延昌四十年(600),麴孝崇妻张氏衣物疏”中所提的殿中将军麴孝崇之妻张氏,即中国旅顺博物馆所藏的九号干尸——木乃伊(整理号码20.1602),是手杖的最合适的主人。^③另外,橘氏带来的东西运到神户是六月十二日,可以看出,橘氏是将手杖和其它若干文书类随身携带的,所以,我认为李慈艺告身是其随身行李之一。

橘瑞超氏于六月五日二乐庄复命后,出席了足利佛教大学校长、原田执行所参事长、堀贤雄通报所所长茂野参事、斯波监事、野村荣三郎部员六人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之后,^④六月十四日在佛教大学讲堂,他以《新疆跋涉谈》为主题发表了讲演。^⑤演讲之后,当晚乘坐夜班火车为出席第四次布教研究会的成立仪式,与大谷光瑞门主同行东上。^⑥此事与橘氏六月六日的信中所说“近日内东

① 本愿寺《年谱》第66页。

② 高野《苏峰とその时代》第314页。

③ 拙稿《关于旅顺博物馆所藏的西域出土文物》,载《龙谷大学论集》449号,第174-178页。

④ 芦屋美博《图录》第195页。

⑤ 芦屋美博《图录》第195页。

⑥ 本愿寺《年谱》第66页。

上之际,一定登门拜访”是相符的。因此我认为:恐怕这时二根手杖已带去东京了,参看这次在芦屋市立美术博物馆的《二乐庄和大谷探险队展》中展出的本愿寺史料研究所藏《发掘书画表具清单》中,明治四十五年六月十五日的这个条目使得这一事实就更加具体化了。^①这时,可以知道由大谷探险队从西域带来若干物品,已经寄往东京新桥站站长处了,以下抄录该文如下,以供参考。

六月十五日

一、这次保存了橘氏带回来的绢织画(喇嘛教的数片物品和像是佛画的断片)、使出土文物得以长期保存。(因为此处有从六月二十四日开始的迁村文七来山的裱背)

※:在此文的上部有:“这些裱背完毕、保存。七月六日”的字样。

一、下午一点大阪每日新闻社“关氏照相馆”的人员来山。在黑书院前对书画石像和佛教大学的壁画以及这次橘氏带回来的经文佛画进行一起摄影。

一、摄影完成之后,把以前的经文绘画、泰始木简和橘氏带回来的二本大型佛画帖和孔目司及佛画的二幅荷作交给安彦回漕店,让他们乘坐晚上八时二十分的往东京的快速电车送给新桥车站站长。此事部长和堀贤雄氏以及通报所的盐屋氏等有关人员知道此事。

以上于六月十九日送返。但日期有所偏离。

无二本大型帖。

无二幅曼陀罗画。

小器物品增加。

大谷光瑞门主于六月十九日回山。^② 这些陈列品也在此时送回了。此时他得知二册大型帖和二幅曼陀罗画留在东京。在这情形下可以判断,所带来的李慈艺告身运到筑地本愿寺后,橘氏是在六月十六日拍的照。在《发掘书画表具清单》的六月十五日条目中所载的“孔目司”,是第一次探险时探险队员渡边哲信于明治三十六年(1903)四月二十日(星期三)在克孜尔千佛洞发掘出来的“唐建中五年(784)孔目司帖”(28.8×37.5),现保存在中国旅顺博物馆,整理号为20.1609。^③另外“泰始木简”即是《西域考古图谱》下卷史料1—(1)“晋泰始五年(269)木制招子”(阿托明布拉克出土)。橘氏于东京出发的前一天六月十八日的晚上,在神田美土代街的青年会馆进行了演讲。这是由苏峰氏担任社长时的国民报社主办的中央亚细亚探险演讲会,负责介绍橘氏的是国民报社社长苏峰氏。^④当时的介绍文章及橘氏的演讲内容于同年八月二十八日以橘瑞超师著《新疆探险记》的形式在东京民友社出版,在这本著作的卷首图版中有这次发现的四张照片中的第二张,旁边还附有以下说明:“开元四年(唐玄宗)(717AD)赏给立战功的485名战功者的奖状中,下令给主者李慈艺赏状的一部分,这在发掘物中是保存完好的一件。”李慈艺的告身,作为唐开元初年的实物告身,很早就颇受许多学界前辈的关注。这告身在吐鲁番被发现的经纬不详,只是在吉川小一郎的《新西域记》下卷中有如下记载:“支那纪行”明治四十五年(1912)三月二十七日(星期三)条中有“本日挖掘坟墓四处(二堡三处、三堡一处)。从二堡挖出土器数个、珍珠四十粒,从三堡挖出镜一面、笔一支、土器

① 芦屋美博《图录》第166页。照片36。

② 本愿寺《年谱》第66页。

③ 拙著《大谷文书の研究》(法藏馆1996年。以下简称小田《大谷文书》)第70—72页。

④ 苏峰《史传》第78—79页。

数个、唐代的辞令书数张,绢织唐画的断片等,顿时大家意气风发”。由此可知,告身是这地区出土的。另外,在同一本书(607页)的“坟墓及槨中状态”中,又记有“看到高官在世时的辞令书及其他物品被卷放在棺中保存”。还有橘氏在《新疆探险记》中提到的“发掘物中保存完好的一件”以及苏峰氏也证实“发掘物中之最尤之一也”。由此,可以看出这告身是卷起来的物品。

现将这次发现的李慈艺告身的四张照片移录于后(相一)、(相二)、(相三)、(相四),以供参考。

三

[相一](9.5×13.5)

(前 缺)

1. 瀚海军破河西阵白涧阵土山阵双胡丘阵伍里墩阵东胡袄阵等总陆阵
 2. 准开元三年三月廿二日 敕并于凭洛城与贼斗战前后总叙陆阵比
 3. 类府城及论台等功人叙勋则令递减望各酬勋拾转
 4. 白丁西州李慈艺^{高昌县}
 5. 右 可 上 护军
 6. 黄门泾州梁大钦等壹拾肆人庆州李远
 7. 托等伍拾漆人绛州张忠等捌人鄜州杨元
 8. 曠壹人延州王守琳等壹拾貳人瓜州郭无
 9. 惑壹人坊州王阿婢等壹拾陆人晋州郭
 10. 敏子壹人蒲州程崇宪等壹伯参拾伍人
 11. 北庭府任慈福等壹拾肆人陇州强怀贞
- (注:1—5行铃满“尚书司勋告身之印”,共四排,每排五方)

[相二](9.7×14.3)

11. 北庭府任慈福等壹拾肆人陇州强怀贞
12. 等玖人甘州王怀义等参人岐州霍玄庆
13. 等壹伯伍拾人宁州王思智等壹拾玖人西州
14. 石定君等壹拾壹人虢州蔡大悦等貳人
15. 幽州陈思香等貳人总肆伯捌拾伍人并战
16. 若风驰捷如河决宜加朝奖俾峻戎班
17. 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18. 开元四年正月六日(注:此行有印5方)
19. 兵部尚书兼紫微令上柱国梁国公臣姚崇宣
20. 银青光禄大夫行紫微侍郎上柱国臣苏颐奉
21. 朝散大夫行紫微舍人上柱国臣王邱行

[相三](9.7×8.7)

1. 等言
2. 制书如右请奉
3. 制付外施行谨言

4. 开元四年二月廿五日(注:此行有印5方)
5. 制可
[相四](9.7×13.9)
1. 告上护军李慈艺(注:此1—2行押印5方)
2. 奉被
3. 制书如右符到奉行(注:“制”字下有印4方)
4. 元
5. 璿 张 祯
6. 马 岳
7. 开元四年二月十八日下(注:此行押印5方)

这份李慈艺告身的实物何在,现在仍是个谜。因此,这四张照片当然也就成为珍贵的史料了。四张照片中,过去发表过的照片只有[相二]一张,其余三张均未公开过。这次在庆祝德富苏峰纪念馆创立三十周年这一值得纪念的年份里能发现这些照片,实属庆祝活动中最值得庆祝的事。如前所述,[相二]曾刊登在橘瑞超师所著的《新疆探险记》(东京民友社1912年)中。遍查整张照片,没有一处记有李慈艺的姓名,但在该图版的说明中,明确指出了它是“颁发给李慈艺奖状的一部分”。单凭这张照片的图版,为什么可以作如此说明呢?过去对此问题一直抱有疑问。但是通过这次的发现,疑虑消除了。因为[相一]的第11行与[相二]的首行在摄影时拍重了,证明两者本是联在一起的。因而撰写图版说明的人知道此事无误,当然能明确指出这是李慈艺的“告身”了。[相三]、[相四]在此次发现之前没有听说发表过,只是对于[相一],石滨纯太郎在《龙谷史坛》第二卷第二号(1929年2月)的“流沙遣文小记”中曾介绍说“罗振玉早就引用过该文字”。其根据乃出自王国维《观堂集林》中所收《唐李慈艺授勋告身跋》中。^①另外,罗福苾所编《沙州文录》的《附录一卷》中,以“李慈艺授勋告身·出吐鲁番·今藏日本大谷伯家”为题刊登了如下的记录文字。^②

瀚海军破河西阵白涧阵土山阵五里墩阵东胡袄阵等总六
阵准开元三年三月二十二日敕并于凭洛城与贼战斗先后
叙功六阵比类府城及论台等功人叙勋则令递减望各酬勋
拾转

白丁 西州李慈艺^{高昌县}

右可上护军

黄门泾州梁大钦等十四人 并战若风驰捷如河决宜加
朝奖俾峻戎班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开元四年正月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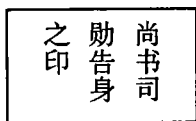
兵部尚书并紫微令上柱国梁国公臣姚宗宣

银青光禄大夫行紫微侍郎上柱国臣苏颐奉

^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73年)第877—881页。

^② 《罗雪堂先生全集》四卷(十二)(台湾大通书局有限公司)第5845—5846页。

朝散大夫行紫微舍人上柱国臣 王邱行



这段记录文字,大概是 1914 年时年 49 岁的罗振玉在日本时于六月到六甲的二乐庄与橘瑞超氏见面时抄下的。罗氏于该年八月著《西陲石刻后录》一卷,在该书序中谈到是年夏天六月大谷光瑞师在二乐庄向学者公开展示从西域带回的文物,罗氏此时前去参加,移录了吉川小一郎 1912 年 6 月在吐鲁番三堡发现的“武周康居士写经功德记碑”一事。^①另外,罗氏是年 8 月著《日本橘氏敦煌将来藏经目录》。在该文中也谈到今夏展示会时与橘瑞超氏见面,并抄下了橘氏编纂的《敦煌将来藏经目录》一事。^②在《沙州文录》的附录中,除李慈艺告身之外,还抄写并登载了下述大谷探险队带回的文书。这些文书是:唐建中五年(784)孔目司帖(库车)(旅顺博物馆藏·整理番号 20.1609);唐掬拓所文书(库车)(27×19)大谷 8066 号文书;检校掬拓使牒上(库车)(28.5×11)大谷 8062 号文书;唐大历九年(774)二月目胡子牒(库车)(28.1×23)大谷 8044 号文书;唐大历十六年(781)三月杨三娘举钱契(库木吐喇)(28×28.5)大谷 8047 号文书;唐大历十六年(781)六月米十四钱契(库木吐喇)(25.6×19.5)大谷 8056 号文书;唐代某人举钱契(库木吐喇)(21×23)大谷 8055 号文书。^③罗振玉该年夏天到过二乐庄的天数不明,如果只呆一天要抄这么多文件的话,那确实是一项繁重的劳动。拿罗氏所抄的李慈艺告身和今次发现的照片对比便可发现其中相当的部分被省略掉了。其中最大的省略部分是从[相一]的第 6 行“黄门泾州梁大钦等壹拾肆人”处直接后接[相二]第 15 行以下的“并战若风驰捷如河决……”夹在两处间的记事内容全被省略了。

这种省略或许出自罗氏要在短时间内抄下这些文书的缘故。另一点可以推断的是因该告身的轴中的[相一]与[相二]部分被打开展示了。所以可以说罗氏抄写时是(有意)省略了中间部分。1933 年,内藤乾吉氏考虑到对研究秦元告身的参考问题,在其论文《敦煌出土的唐骑都尉秦元告身》(《东方学报》京都第三册)中把《沙州文录》附录中的李慈艺告身的抄录文字也登出来了。而且明确指出:“该告身后部不全,是在被授勋的瀚海军梁大钦等十四人和勋拾转的上护军(比正三品)中、赏赐其中李慈艺一人的(部分),其形式与秦元告身和张九龄告身相同”。此外还明确指出其根据就在于制授告身式。而后,内藤氏的这篇论文又收在他 1963 年出版的著作《中国法制史考证》(有斐阁出版)中。在该书的补注 1 中,说明[相二]系由橘氏的《新疆探险记》的照片中发现,并说明“右中([相二]15 行以下)的‘并战若风驰’以后的部分虽然见诸于《沙州文录》的录文中,但其前部在《沙州文录》中被省略了。《沙州文录》在此处空有两格,这两空格大概是为了表示省略吧”。由此推定这个部分早就被罗氏给省略了。他还推定:根据被省略部分的文字,被授勋的总人数为 485 人,但是这段文字中所出现的诸府州的授勋者算起来才 210 人,加上《沙州文录》中的泾州梁大钦等十四人即为 224 人,所以,此段文字前还有记载 261 人的部分。

① 荣新江:《吐鲁番出土〈武周康居士写经功德记碑〉校考——兼谈胡人对武周政权之态度》,载《民大史学》第一期 1996 年,第 6 页。《永富乡人行年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51 页。

② 《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二十(文革出版公司,1968 年)第 8716 页。

③ 小田《大谷文书》第 70—87 页。

但是,实际情况如何呢? [相一]与[相二]中的受勋者总共才455名,因此还少了30名。对此又该如何加以理解呢?一种想法是:当时开元令刚制定不久,而且边境上有大量的军功需要授勋,在对这些人的人数确认时有可能产生一些误差,不过这一点尚有待日后考证。后来,1960年大庭修氏把《沙州文录》附录《观堂集林》所收称作“甲告身”;把橘氏《新疆探险记》卷首刊登的照片作为“乙告身”,考察了两告身的关系。他在《西域文化研究》第三(法藏馆,1960年出版)中所收的《唐告身的古文书学的研究》中断言“甲、乙两告身决不可能是两个不同的告身”。他一方面认为在[相一]和[相二]之间有不明确脱落行的存在;另一方面根据石滨先生的提议对本告身进行了复原,^①这是一种高见。自从罗氏发表本告身的抄件以来,关于李慈艺的告身问题,在前辈学者之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见解。但是,因为实物不明,一切只能处于纯推测无实证的状态。此次这些照片的发现,一下子填补了大约七十年来关于本告身资料方面的空白。从这一点来看,我认为此次照片的发现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四

德富苏峰对该告身照片做出鉴定的明治四十五年(1912)时的日本,已经强大得可以和欧美列强并驾齐驱,而且通过缔结日英同盟,已在逐渐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但是,当时并不盛行研究亚洲问题,在东洋史学方面也仍是以汉学为中心,此前一年的明治四十四年(1911),东京帝国大学的支那学科也才刚改为东洋史学科。在这样的时代中,苏峰氏看到[相二]中的兵部尚书兼紫微令上柱国梁国公姚崇及银青光禄大夫行紫微侍郎上柱国苏颋的名字,便写下“看开元贤宰相名字”这件事,说明了苏峰氏平时常读《新唐书》、《旧唐书》以及《资治通鉴》等,对唐代史颇有兴趣。当然,姚崇和宋璟作为“开元之治”的中心人物,是并列被称为“姚宋”的宰相。可以与太宗的“贞观之治”时被称为“房杜”的名宰相房玄龄、杜如晦相提并论的人物。

姚崇(650-721)在《新唐书》124卷及《旧唐书》96卷均有传。他出生于陕州硤石(河南省三门峡东南),是个活跃于则天武后、睿宗、玄宗三朝的人物。玄宗于712年即位后,于713年十二月改年号为开元,这年十月,玄宗召见同州刺史姚元之,把他提拔为宰相。这个姚元之,便是姚崇。因为在则天武后晚年(704年前后)突厥的叱利元崇反叛时,武后讨厌姚元崇与之同名,曾让姚元崇改名为姚元之。^②在玄宗改元时,中书省、门下省、侍中也同时分别改为紫微省、黄门省和黄门监。当时,姚元之兼任紫微令,又为着避开“开元”尊号,而再次改名为姚崇。^③姚崇作为答应任宰相职务的条件是建言政治革新大纲十事,论述了武后、中宗、睿宗时代与政治相关的弊害十项之多。^④姚崇请玄宗答应清除这一弊端,而且为克服过去的政治混乱局面而全力出任。这就是“开元之治”的开始,他也因此被称为宰相。当时姚崇还官拜兵部尚书,被封为梁国公。^⑤他历任武后、睿宗、玄宗三朝的宰

① 大庭修“唐告身の古文书学的研究”《西域文化研究》第三(法藏馆,1960年)第295-299页。

② 《旧唐书》卷96,姚崇传。

③ 《旧唐书》卷96,姚崇传。

④ 《新唐书》卷124,姚崇传。

⑤ 《旧唐书》卷96,《新唐书》卷124,姚崇传。

相,并兼任三朝的兵部尚书。这是因为他精通边境的屯戍、斥候和士马、储械的缘故。^①开元二年(714)一月,他上奏了如下奏章:“佛不在外,求之于心。佛图澄最贤,无益于全赵,罗什多艺,不救于亡秦。何充、苻融、皆遭败灭。齐襄(北齐的文襄帝·世宗)、梁武(梁的武帝)未免灾殃。但发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苍生安乐,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奸人,令坏正法”。玄宗因此听从其言,命有司检括僧徒,令伪滥僧人一万二千余人还俗。^②不过,从姚崇的这段话来看,可以看出他认为众人的幸福只能依靠为政者的良政的想法。另外,这段话也可以说是他所从事的“开元之治”的根本精神。开元四年(716)年底,因为他两个儿子和他的亲信中书主书赵海涉嫌受贿,结果以为此事负责的形式,姚崇辞去宰相,推举广州都督宋璟(663—737)接替自己的职务。与宋璟同时作为紫微黄门平章事共当国政的是苏頌(670—727)。苏頌传见诸于《新唐书》125卷及《旧唐书》88卷,他是宰相苏瓌之子,比姚崇小20岁。他从小富有才华,擅长文章。在睿宗景云中任工部侍郎并被加封银青光禄大夫。其后于开元四年(716)迁为紫微侍郎,成为紫微黄门平章事。^③此事对照李慈艺告身的日期,便可知为开元四年正月。^④第二年开元五年(717)九月,官职名称再次改变,紫微省恢复为中书省,黄门省恢复为门下省,黄门监恢复为门下侍中。^⑤另外,李慈艺告身中记载的第三位人物王丘,在本告身中因避孔子讳而把“丘”改为“邱”,他的传记见诸《新唐书》129卷,《旧唐书》100卷。他是光禄卿同皎的侄子,父名为同珪,小时善于词赋,行为端正。武后的长安年间(701—704)任监察御史,玄宗的开元初期累迁至考功员外郎,其后三次升迁,任紫微舍人,加封朝散大夫。^⑥其任官年分,从告身本身可以看出,与苏頌一样,也是开元四年(716)正月,他卒于天宝二年(743)。他虽然身居要职,却是清廉之人,所有贿赂,一概不受,住在一般的住宅中,由此可见,开元四年正月六日的李慈艺告身中连名出现的姚崇、苏頌、王丘(邱)都是优秀人物。而玄宗也正因为拥有这种清廉公正的臣下才能推行“开元之治”的善政。

以上围绕着这次在德富苏峰纪念馆发现的李慈艺告身照片的问题,对摄影经过及其移录以及苏峰氏所着眼的姚崇等人进行了若干考察。自1929年石滨先生介绍以来,对本告身的不明确之处,通过该照片的发现已经全然冰消了。关于本告身的内容等问题,我拟另行撰稿。^⑦最后,在该文结束之前,谨向于平成十二年一月十九日允许我发表“李慈艺告身照片及苏峰先生鉴定录文”资料的德富苏峰纪念馆的盐崎财团理事长竹越超一氏以及同馆有关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① 《资治通鉴》卷210,开元元年冬十月条。

② 至是姚崇上奏曰“佛不在外,求之于心。佛图澄最贤,无益于全赵,罗什多艺,不救于亡秦。何充、苻融,皆遭败灭。齐襄、梁武,未免灾殃。但发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苍生安乐,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奸人,令坏正法?”上纳其言,令有司隐括僧徒,以伪滥还俗者万余人(《旧唐书》卷96,姚崇传)。又《资治通鉴》卷210页开元二年春正月也记了这一条。今依之。有关当时对佛教政策的批判等,从吉川忠夫的“佛在心中——从‘黑白论’到姚崇的‘遗令’”《中国古代人の梦と死》(平凡社,1985年),或砺波护《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同朋舍,1986年)“第IV部·佛教与国家”,均可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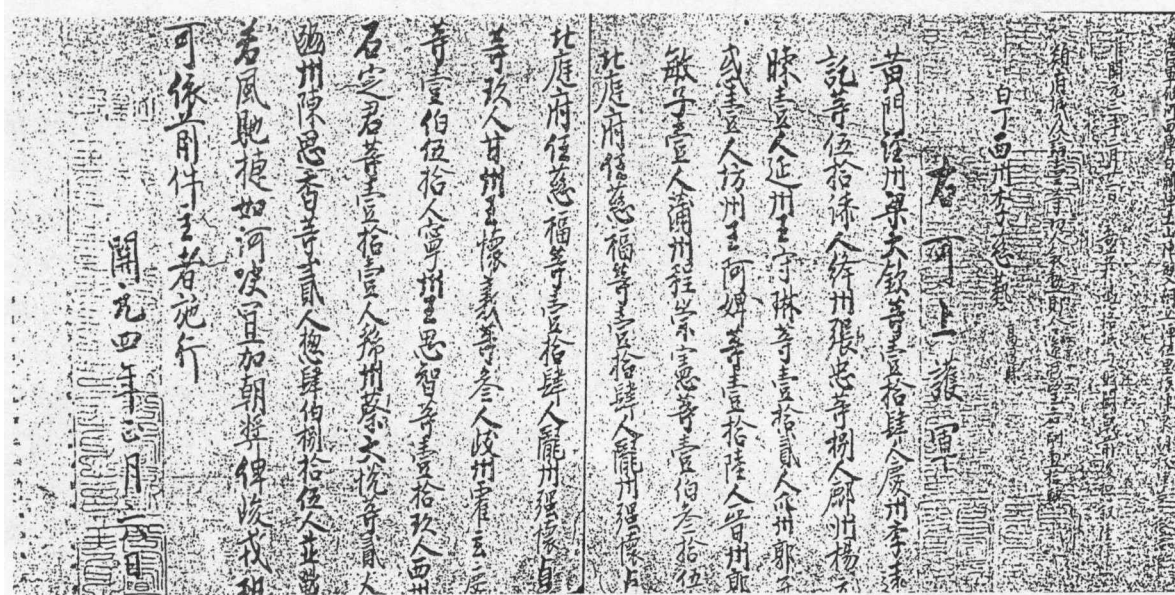
③ 《旧唐书》卷88,苏頌传。

④ 《旧唐书》卷88苏頌传载:“开元四年,迁紫微侍郎,同紫微黄门平章事”。《新唐书》卷125苏頌传载:“开元四年,进同紫微黄门平章事”。在本告身中,有“开元四年正月六日”付,“紫微侍郎上柱国臣苏頌奉”,由此知他迁紫微侍郎在开元四月正月。

⑤ 《资治通鉴》卷211,开元五年九月条。

⑥ 《旧唐书》卷100王丘传。

⑦ 就当时的告身式而言,当然[相三]与[相四]之间还应有一张照片,不过,这一张却没有贴出。



相二

相一



相四

相三



德富苏峰氏题跋

(作者系日本龙谷大学文学部教授 译者系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责任编辑:刘国防 责任校对:陈霞